

# 《潜研堂文集》学者传记与清代学术史的书写

冯 坤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三十九的一组学者传记,历来被简单的作为《汉学师承记》的原始材料看待,导致其中作者记录当代学术史的意识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从这组传记的传主选择,到它们的写作方式,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史家眼光与精心选择。而我们熟悉的《汉学师承记》,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人物选取、写作体例,也都可以追溯至这组传记之中。

[关键词] 钱大昕;清代学术史;《汉学师承记》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5-0104-04

## Scholars' Biographies in *Qianyan Tang Collected Works* and the Writing of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FENG K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eries of scholars' biographies in Volume 38 and 39 of Qian Daxin's *Qianyan Tang Collected Works* have been viewed simply as a raw material of Jiang Fan's *Biographies of Han Learning Scholars*, while the author's writing of academic history hasn't received the due attention. Both the choice of scholars and the way of writing reflect the author's historian vision and elaborate selection. And some questions in *Biographies of Han Learning Scholars*, such as the character selection, writing style, can also be traced back to these biographies.

**Key words:** Qian Daxin;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Biographies of Han Learning Scholars*

提及清代学术史,尤其是清代汉学史的整理与书写,学者们一般会溯源至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在《汉学师承记》所采取的史料之中,最为重要的一批莫过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三十九的一组学者传记。<sup>[1]</sup>这组传记对于《汉学师承记》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如果加以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江藩引自钱氏传记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原文照录,至多部分词句略有改动。相比之下,对于其他史料,江氏或为节引,或亲自加以组织,由此可见钱氏传记重要性之一斑。笔者认为,钱氏传记不应当仅仅被当做一种原始史料来加以看待。与其说它们是江藩书写清代学术史

的原始资料,更不如称之为《汉学师承记》之前对钱大昕有关学术史整理的一次尝试,或者说是清代学术史的书写过程中没能来得及加以展开的一个可能,但对清代及以后的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影响。

### 一 钱氏传记的基本情况

钱大昕的这组传记在《潜研堂文集》中单独编为三十八、三十九两卷,与文集中其他内容并不相混。传记前后并无序跋,亦无其他介绍性文字,只有标题、格式前后统一。传记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包括严衍、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惠士奇、王懋竑、惠栋、江永、戴震、钱塘等11人。

收稿日期: 2014-02-24

作者简介: 冯 坤(1985-),女,天津市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它们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也无法考证是否为一时一地之作。不过我们可以从戴震传记中找到一些旁证,从而推断其写作时间:此篇中提及戴震亡故后由孔继涵刊行其著作,<sup>[1]</sup><sup>716</sup>但篇中所列出的孔氏所刊书目与今天我们所见的《戴氏遗书》相比犹有缺漏,而且篇中并没有提及段玉裁重刻的12卷本戴震文集。我们知道,孔氏刊行《戴氏遗书》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到四十四年之间,段氏重刻在乾隆五十七年,故此篇可以大致推断为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四年之间完成,或许下限可以放宽到乾隆五十七年。另外钱塘别传提到了钱塘的去世,春秋五十有六。钱塘少钱大昕7岁,卒年亦当在乾隆四十二年。综合起来看,两篇不同的传记皆作于乾隆四十二年之后,这组传记有可能集中创作于乾隆四十二年后至乾隆四十四年前这一段时间,最迟不过乾隆五十七年。

关于这组传记的传主选择,笔者个人的看法如下:严衍为嘉定先贤,与钱大昕同乡。此人当明季之世,致力史学,大昕传中称:“当时无通史学者,咸笑以为迂”,可见严氏既为乡贤,又得考据学风气之先,因此在钱氏传记之中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其后阎若璩、胡渭二人辨《古文尚书》与《易》图,其考证直接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惠氏父子坚守“汉学”,倡导风气,江永、戴震为一时之杰,这四位算是考据学家的中流砥柱。其余的万斯同、陈祖范、王懋竑持学与考据学者各异,然而不废经史,汉宋兼采。这一组文章应该可以归结为对清前期一代学者的共同记录,不过它们在撰写方式上可以说仍然脱不掉钱氏作为考据学者的影子。如江永虽然精于考据,但他同时也信服程朱理学,钱氏的江永传中便完全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又如,洪榜也曾作过戴震行状,<sup>[2]</sup>其中多引《孟子字义疏证》,这部有关义理的论著是戴氏生前得意之作,而钱氏戴震传不采;钱传中另收入戴震论《易》、论《周礼》、论明堂三条,钱氏所采而洪氏所无。然而这些忽略很难归结为钱大昕有意从自己个人治学的偏好出发来剪裁史实,因为这组传记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内容,与钱氏个人的治学倾向相差甚远,至少传记从人选上便没有拘泥于考据学学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象更适合被看做史实经过作者眼光折射后的结果。作为一个考据学家,钱氏不自觉地首先将眼光投向了考据这一方面。

## 二 钱氏传记的写作目的与写作方式

从梳理学术史的角度看来,这组传记的确难以看做完整的作品。它们没有单独成书或结集,也没有统一的名目。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可以从推知它们的写作规划,从而获得更加详细的创作信息。真正将它们与文集中其他传记区分开的特征,是传主本身的身份,以及钱氏写作的方式。它们的排列大致以时间为序,虽然传主治学倾向彼此不同,但仍然一同并列,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惠氏父子已经有了明确的传承关系,但二人之间还是隔了一篇王懋竑的传记。从这一点看,钱氏的做法不如江藩《汉学师承记》体例严谨,按照交游和学术理路分卷。从涵盖的人物范围来看,钱氏传记所收人物不多,更像是为当时学术界的主要人物留下一组剪影,而不是类似于学案式的著作,试图囊括整个学术界,给每个学派、每位人物进行品评,安排适当的地位。当然这组传记也并非严守一派之学,详细剖析清代考据学的学术传承。钱氏传记的创作,其布局谋篇多少存在着粗陋之处,而当时的客观环境也未必完全适合:由钱氏论及当代学术史,其本人以及姻亲王鸣盛自然需要回避。当时钱氏的平辈与后辈人物也仍然在世,因此有些人物不便加以论定。由此看来,以钱氏当时的情况而言,全面书写当代学术史的条件其实并不十分充足。

这组文章的写作缘起,目前仍然隐没不明。在钱大昕的文集与日记等资料中还没有看到有关学术史整理以及类似意愿的文字,甚至不见打算给学者作传的只字片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证据表明,这组传记并非无意之作。在钱氏这组传记之前,我们所能查考到的有关这些学者的其他传记资料——以漆永祥先生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第六章“《汉学师承记》史源考”所考<sup>[3]</sup>来看,几乎均为零散的碑传、行状、墓铭。这类材料的写作是个人性质的,不仅单独针对传主个人,而且写作目的也出于传主与作者的私交。但是钱大昕与其中很多学者时移世异,并无交往。钱氏为他们作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作者自身的历史担当。杭世骏曾经作过阎若璩传,自称“以待秉笔者为考信之地”,<sup>[4]</sup>而钱氏为诸多重要学者作传,又何尝不是如此,非存留一代学术大况以待后人而何?

此外,从写作体例来分析,则会发现这组传记与其他行状、墓铭的不同之处。钱氏传记的内在结构,是按传主的学术观点来组织。传记的写作方式,是摘录传主论学之言,并加以排列组织,用来构成传记文的主体。钱氏传记可以看做一个综合体,内容包括了传主的简略行述,以及传主学术的综述,这便已经不同于其他传记以传主生平活动为线索的组织方式。钱大昕的妻兄王鸣盛,同样是著名学者。钱氏为王氏所作的墓铭不在这组传记之列,而另外收录于《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sup>[1]838</sup>将这篇墓铭与传记对比,便可以看出这组传记的体裁是经过刻意选择的,更加偏重于学术性。这组传记中唯一的例外是万斯同传,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万氏成就主要在《明史》,对于清代统治者而言,忌讳颇多,不便摘录。不过在钱氏传记之前的传记资料中,有那么一篇还是不可忽视的,即戴震为江永所作的《江慎修先生事略状》。<sup>[2]</sup>此文作于乾隆壬午年(1762),写作时间或早于钱,而体例则与钱氏几近相同。《汉学师承记》于钱氏极为尊信,阎、胡、惠氏父子诸记均依钱传而成,唯江永传主要依据戴震之文,这一点后文将继续展开论述。除此之外,钱氏为钱塘作传,称为“别传”,乃是出于“惜其未及中寿,而撰述或不尽传,因仿魏晋人别传之例,述其事目如右”。钱大昕于史例极为精熟,由此可见一斑。

这组传记由这样一位精通史例的史学家以独特的方式写成,并且有意识地独立分卷,不与其他传记相混,那么它多少值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不是被当做零散的原材料而埋没于碑传行状之中。历来学者,如周予同《清朝汉学师承记?序言》,均以《汉学师承记》上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而笔者认为,在二者之间,可以再加上钱氏传记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作为清代学术史的书写的首端。这一组传记固然很难直接视为典型的“学术史”,但至少可以看做是“准学术史”,是以书写学术史为目标的准备工作。而在它之后的时代,学术史的写作,也或多或少折射出了这一组传记的特点。

### 三 钱氏传记与《汉学师承记》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汉学师承记》为何以阎若璩、胡渭开篇,而将时代更早的顾炎武、黄宗羲置于附录的问题。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自己给出的解释,一是

“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二是“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名编薰胥之条,岂能入儒林之传哉”。<sup>[5]</sup>后来的评论也大多根据这两条展开,有些意见置疑江氏严守汉学门户之见,以致对大儒要求过严,而且江氏《汉学师承记》中又有非汉学家者夹杂其间,于是遂云江氏自乱其例。另外一些评论则集中于批判清代文字狱之酷烈,使人避席不敢谈遗民之事,甚或有人联系阎若璩传内受清世宗宠信一事,从而攻击江藩作传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于此漆先生书中考辨甚详,而本文在这里想要附上一点看法:钱大昕的这组传记中,开篇的是严衍,然而严氏是嘉定人,传中又称赞其“时邑中诸名宿,皆以诗文自名,先生独专心古学,耻以词华炫世”。此人在明后期的特定时代,起的更多是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于钱氏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么除去严衍之后,清代学人的开端正是阎若璩、胡渭。钱氏既然可以给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作传,自然不会严守门户之见;而钱氏又曾在文集中直书“嘉定三屠”,<sup>[1]355</sup>同样也不可能出于畏祸而对顾、黄这样的遗民学者避而不谈。江藩是否直接承袭了钱氏的做法,这里不能确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将清代学术的源头归于阎、胡,可能是清代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当时人看来,将阎、胡归为清代学术的直接来源,可能并不十分突兀。而时代更早、甚至启发了阎、胡的顾、黄,在考据学家们的心理上或许已经离开清代学术相当远了。

另一个问题则有关《汉学师承记》的体裁。江书的写作,是以传记的格式,结合学案式的内容。这种写法与正史儒林传最大的不同,便是先将传主本人在著作中的表述加以选择,再进行组织,合成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作者的个人意见主要表现为传主及材料的选择,而较少表现在文字叙述及评论中。与此相对,传统的传记则由作者采用自己的语言对传主的生平和学术概况加以叙述和评价。无论如何,这一点历来引起了很多注意:有些学者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如黄式三称江书“不矜裁削,于后儒所讲起收虚实之法不拘焉。后之为艺文志、儒林传者,将必取法于是也哉”;另外有些学者给出反面的评价,如徐复观称“江氏书中各传,多取自他人所作,他便在增删中弄手脚,以符合他所说的汉学家的标准”。<sup>[3]</sup>与江藩同时代的人同样意识到了这

一点,如阮元自任编撰《国史儒林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漆先生书中评论江、阮等人这一想法时称:“这是当时考据学家所共同的思想,很难说是谁影响谁”。而纵观这些对于江藩书体例的评价,似乎都完全忽略了江氏著书的史源文本有着什么样的结构。正如上文所述,钱大昕在这组传记的写作中已经有意运用了这种方式,也同样在江氏之前便显示出了这种写法所不能回避的缺陷——作者的个人观点影响到了材料的选择。虽然摘录的方式减少了读者误读的可能,但作者的个人观点仍然在材料的去取上影响了对历史的阐述。而更早于钱氏传记的,是戴震在江永去世后不久便写作的《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对于江永,极力推崇其学术、推荐其遗书,写作的目的如状中所述,也有避免“书未播广播,恐就逸坠,不得集于太史氏”的用意,故而与一般行状不同,略生平与言辞,而详细记载学术。钱氏江永传从开篇所述江氏治学之路的词语,到江氏治学材料的选择与排列次序,都能看出戴状的痕迹。钱氏的想法是否源于戴氏,或许不能就此结论,然而由此可见,这种传记体裁的应用,显然已经不是江藩、阮元一代学者的普遍观念,而是应该上溯至钱大昕、戴震一代人了。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江藩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史料的去取,有多大程度出自维护汉学门户的私意。徐复观先生称之为“皆取自钱氏,而妄加点窜,点金成铁”,这种说法显然是太过主观了。如于阆若璩,江氏所不取者有四条:论孔门从祀当广为十二哲,辨《大学》传文非出自曾氏门人之手,辨《檀弓》载曾点倚门而歌事之妄,举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之误。这四条不仅于汉学无碍,反于攻宋学有力。另外一处明显的去取是江永传不取论《深衣》、论《论语》两段——然而这种做法本自戴震。另外,江氏的戴震传,取《孟子字义疏证》——这是对理学的供给——而不取钱氏记论《易》、论《周礼》、论明堂三条,然而《孟子字义疏证》本是戴震得意之作,这一条也是本自洪榜之行状,钱氏不取本是钱氏的忽略。漆永祥先生在书中也曾提到过江藩忽略江永

尊信朱子这一方面,然而戴震只言及江永“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虽黄氏杨氏相继纂续,犹多阙漏,其书非完”,而作《礼经纲目》。钱大昕甚至并无此句,可见江氏之书,虽然其他地方确实可能选择了对汉学有利的材料、删削调对宋学有利的材料,但某些情况下也实乃一代考据学家之通病,不一定是有意为之。

总体说来,钱大昕这一组传记,在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中还是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的,它们应该被承认为学术史书写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从它们这里可以看出随后的学术史书写中一些问题的来源。而另外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组传记既然作为一代学术之留影,而非学派之记录,那么其中有《汉学师承记》也未及兼顾的内容,尤其是在万斯同等人亦未被列入《宋学渊源记》的情况下,这些内容便具有着更多的意义。即使是完全从新观点来写作的学术史,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考据学往往一笔带过,而论万斯同仍多本钱氏之说。在这一点意义上,以钱大昕这一组传记为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发源,并不为过,它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 参考文献:

- [1] 钱大昕. 潜研堂集[M]. 吕友仁, 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2] 戴 震. 戴震文集[M]. 赵玉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178.
- [3] 漆永祥. 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135.
- [4] 杭世骏. 道古堂文集: 卷二十九[M]. 清光绪十四年钱塘汪氏振绮堂本.
- [5] 江 藩. 汉学师承记: 宋学渊源记[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3:135.

责任编辑: 骆晓会